



在我们一般人看来,考古这门学科和“盗墓”或者“寻宝”差不多,都是拿个铲子在古墓里面挖文物。每当听到这个说法,来自山东大学考古队的武昊就要无奈地笑一笑。盗墓者总是比考古人潇洒。他们打了个盗洞,挑拣了值钱的东西就离开。考古人不行,他们要赶在古墓被彻底破坏之前进行发掘、整理和记录,把历史留下来。

所谓的考古学,教科书给出的定义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研究的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这种调查发掘,考古人称之为田野调查发掘。

不过,在真正开始发掘之前,先要“打前站”。“打前站,其实就是考古队先行派出几个人到挖掘现场附近去办理食宿等事务,并和当地的居民、有关部门对接,以保证考古队的工作能顺利展开。”武昊对记者解释道。

看似平常,真正做起来却并不简单。“我们经常被人怀疑是来挖宝或者盗墓的。”武昊说,在对焦家遗址进行挖掘前,考古队员们就经历了这么一次“误解”。

陆青玉,山大考古队队员,曾参与2016年对焦家遗址的挖掘。那时候的焦家遗址,从外表看就是一片农田,农田的中央是一片种粮食的高地,低矮处有树,四周被村庄包围。

确定好位置之后,陆青玉和他的队友们马上在一户村民一亩多的耕地上建了很多四方的池子,搭建起临时板房做起了厕所,并向村民打听可以住宿的地方。

考古队员手里拿着的“洛阳铲”,引起了村民的注意。看着这种盗墓小说中所描写的“倒斗神器”,村民们觉得可能遇上“盗墓贼”了。由于在发现焦家遗址时,曾发生过大规模的盗墓活动,许多文物流失到了市场,后来政府费了好大力气,才将这些文物追回。这件事在村民中影响非常大,“文物是属于国家的”,这种观念在当地可谓深入人心。

于是,一些村民马上联系了媒体和有关部门对考古队员们的身份进行了核实,知道他们真的是大学生,才大胆地让考古队员们居住。

正式挖掘之前,考古队员首先进行的工作叫做“布方”。

“比如说发掘一座城址,当我们通过钻探知道了城址大致范围后,我们在根据不同时代的城址特点预判其布局,由此先在遗迹现象比较集中的区域进行布方;如果要发掘墓葬,布方就要大致卡住墓葬的范围。”武昊对记者说,对“布方”区域的选择,直接决定了考古挖掘工作的成败。而要想做出正确的选择除了要以丰富的经验和大量考古学知识储备作为依托外,还需要过人的胆识。

2016年,山东大学考古队在对焦家遗址进行第一次挖掘时,考古队经过勘探,初步判断墓葬在西南,而房址偏东北。考古队一次能挖掘1000平方米,王芬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算是冒险的决定。“我们把发掘区定在两片区域中间,觉得既有墓葬又有房址,能对不同时期遗址上聚落的功能分区和变迁,形成一些关键认识。”

不过在刚开始挖掘的时候,考古队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

“那时候都挖了快半个月了,汉文化的文化层我们都快挖完了,别说大汶口文化的了,早期文化层的器物都没有。”陆青玉对记者说。

当时,王芬和考古队员们都背负了巨大的压力,沉闷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工地。幸好,随着挖掘的深入,在一个探方中出现了处长条形的遗迹。在遗迹中,已有一些房址和灰坑露头,遗迹出现的形状疑似墓葬,随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杯、陶鼎等相继出土。

布方结束,考古队员正式进入探方开始挖掘。据武昊介绍,挖掘的时候,离不开手中的几大“神器”。

洛阳铲,也就是“探铲”,这种“盗墓神器”现在已经变成了专业考古的利器。据武昊介绍,利用洛阳铲钻探,灵活、准确、省工,最重要的是破坏性小,能在短时间内了解大范围的地下情况。洛阳铲每下一铲都能带出土样,通过对带出土样的结构、颜色和包含物的辨别、分析,可以判断出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古墓等情况。

除了洛阳铲,考古队员手中还有一个“手铲”,它的主要用途是用来“刮面”。“刮面”是田野考古发掘最常用的观察和分析地层叠压关系的方法,在清除浮土后后立立即要做的工作便是“刮面”。

据武昊介绍,国内的考古通常是由民工或考古人员自己用手铲慢慢地将整个探方或探方局部刮出平整的新鲜面,观察其土质、土色、包含物的变化,结合探方四壁剖面信息来决定地层单位的发掘顺序。

除此之外,考古队还备有皮尺、方位罗盘仪、象限罗盘仪和标杆等等测量工具,竹签、软毛刷子等清理工具。

烈日炎炎下,在探方里安静地刮面,就是考古学生们的真实写照。

张玥,山东大学2014级考古与博物馆学系本科生,曾参与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考古挖掘。她是这样描述一天的工作的:“上午刚到工地的前一两个小时阳光还不太刺眼,前一天在地上洒的水还没有干透,正是刮面的好机会。过了这个‘黄金时段’,日头变得毒辣起来,过强的阳光实际上也会影响到大家对于土色的判断。而相比于中午的太阳直晒,下午两点以后的太阳就要温柔得多了,这个时候又正是测量绘图的绝佳时机。探方壁的影子越拉越长直至太阳开始西沉,一声‘下工了’终于让大家如释重负。这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车上满载着一天的陶片,带着老师和同学们一路颠簸地开过乡间小路回到住处。”

在这种条件下,可以说发现那些可以弥补历史空白的文物,是支撑考古队员们继续工作下去的唯一动力。

陆青玉现在还记得苦等了半个月后,焦家遗址出土器物时的场景。“那天晚上有刺猬从我们帐篷里爬过,睡觉的时候,头上还时不时地被滴上露水,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大家都很高兴。”

正如张玥所说,考古生活带给考古队员的是一种远离城市浮躁的踏实的生活方式。在工地,他们亲手让一块块平整的耕地暴露出遗迹的模样,亲眼见证四周的麦子由青变黄;在驻地,大家一起过生日、组织活动,彼此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一个已经毕业了的学生曾经说过:“当初觉得生活很苦,吃到一碗米粉都感动得飞起。但是过去之后,最怀念的还是在工地的日子。”

□ 本报记者 朱文龙

## 在田野里挖掘

## 听考古队长许宏讲故事



许宏,作为河南洛阳偃师遗址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任队长,他还被媒体誉为“公众考古的践行者”:身为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他将自己的研究心得通过写博客、微博等方式分享给社会公众,解答网友有关考古的疑问,帮助考古学科走出象牙塔,也把神秘的田野考古带入公众的视野。

我是1999年当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的,那里已经发掘了40年,而我是第三任队长。

当时我们考古队有十来个人。除了我和两个研究人员,还有六七个技师和技工。别小瞧这些技师,可以说是身怀绝技,许多活如钻探发掘、辨土认土,都由他们来完成。同时还负责复原陶片、绘图、摄影、写记录,这是考古队的第二梯队。还有第三梯队,开始发掘后,会从当地的村里雇用村民,作为体力劳动者。

在野外调查时,考古队实行的是“地毯全覆盖”式,即隔一段安排一个人,每个人一部对讲机,再拎一个编织袋,随时把陶片、石器之类的往里放。老乡看见了总觉得形迹可疑,见了就问“你们到底是干吗的,神秘兮兮的”。时间一长,队员干脆编了顺口溜自我调侃:“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问是社科院的,原来是文物调查勘探的”。

考古队最拿手的绝活,叫辨土认土。比如打出来的“五花土”,就知道底下是墓;而宫殿建筑或者城墙的土,则会非常结实,是夯土;广场或路面上踩踏过像千层饼那样的土,叫路土。商代的土汉代的土,基本上到一个地方干一段时间之后,一看就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的土。

2002年春,我们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一座早期大型建筑——3号基址院内发现了成组的贵族墓。当时,墓里除了铜器、玉器、漆器,还有海贝的项链,虽然一开始只露出一点点,不过民工已经知道,很难再保密了。所以我当即决定,抓紧时间清理,而且要全天候盯守。

当时考古队除了队员、技师,还有九个来考古队实习的硕士生和本科生,可谓兵强马壮,于是大家轮班守卫,再把考古队的北京吉普开到跟前,车灯开着,隔一阵就冲着黑漆漆的墓穴照一照,严防死守。同时又从邻村借来一条大狼狗,壮壮声势。这样上半夜还挺浪漫的,男生说说笑笑数星星,还有晚春时节飘着麦香的空气,下半夜温度降下来了,就得穿上大衣,但大家还是斗志昂扬,说我们在给二里头贵族“守夜”。

白天接着干活,逐渐往下清理,就开始挖出很小的绿松石片。一开始没觉得意外,因为二里头很早就出土过。但这个墓很怪,整个绿松石片范围达到70厘米,从这个墓主人的肩部一直到胯部。当时不要说用竹签来剔这些绿松石片,就是用嘴吹一下,想把它上面的土粒吹去的话,都有可能使它移位。

我意识到这样清理不行,清得越细,越不利于文物的保护和以后的复原。而且连续的熬夜守夜,队员们已经非常疲惫。而这个文物在工地上每多呆一天,就多一危险。于是我紧急跟北京考古所的科技中心联系,决定整体取出,放在室内慢慢清理。就这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晚上用一个木箱子,套箱灌石膏,把它从工地清回了位于二里头村的考古队。

运到北京再一清理,它的真面目让以往的一切想象都黯然失色:居然是一条保存完好的大龙!这条绿松石龙形器放置于墓主人骨架之上,由肩部至胯骨处。全器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0.2~0.9厘米,厚度仅0.1厘米左右。可当时如果一片片把绿松石取下来,这条龙就会永远与我们失之交臂。

还有号称“中国最早”的二里头宫城,尽管已经调查了很多年,但解开二里头宫殿布局的一把钥匙,却来自村民的一句闲话。一天一个村民过来说:“许队长,我家地里的小麦长得不好,你看看是怎么回事。”我这心里一喜,因为小麦长得不好很有可能是地下有比较坚硬的东西,渗水不畅,所以导致它结构异常。而在考古遗迹里面,最有可能是宫殿建筑。因为都是用夯土夯的,用夯具夯的宫殿建筑或者说城墙。于是让技工过去一钻探,发现了宫城北边这条东西向的路。顺藤摸瓜,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就这样被发现了。

由是想起早年苏秉琦教授说过的一句话: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遇到什么。当时觉得这话好像有点“唯心”,在以实证为特征的考古学研究中尤其讲不通。在经历了多年的考古实践后,我逐渐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分量和真谛之所在。机遇属于有准备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宫城,不是我们幸运地碰上的,而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到的。

(综合许宏著作《最早的中国》及演讲内容)

□ 出品:副刊编辑中心  
□ 设计:壹纸工作室  
□ 本版编辑:徐静  
□ 美 编:马晓迪